

姜  
彬  
主  
编

稻  
作  
文  
化  
与  
江  
南  
民  
俗

DAOZUO WENHUA  
YU  
JIANGNAN MINSU



# 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

姜 彬 主编

DAOZUO WENHUA  
YU  
JIANGNAN MINSU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徐华龙

封面设计:何礼蔚

**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

姜 彬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75 插页 14 字数 570,000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7-5321-1383-3/K·92 定价:39.40 元

## 序 论

万里长江下游的南岸地方，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过两个有影响的诸侯国家——吴国和越国，因而，这地方至今被后人称为吴越地区；由于它在江之南，又称江南。此地气候温和，风景秀丽，物产丰富，古人多所讴歌、赞美。从六朝到唐宋文士对江南歌颂的诗词歌赋，可以说是车载斗量，特别是宋人柳永的《望海潮》，对东南形胜、三吴风光竭尽歌颂之能事。但这类歌颂，大抵是从士人阶层的眼光出发对江南的自然风光、人事繁华表达了仰慕之情而已，却很少有人对这个地域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加以认真的探讨和思考。在历史书中，我们看到的也只是一些上层阶级的勾心斗角，他们生活上的糜费奢侈、温柔富贵和文人学士的风流逸事等等，却看不到远古祖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发时所走过的足迹，也看不到更为广大的下层民众胼手胝足向山野水涯讨生活的状况和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和信仰活动的记录。

这些大抵是今天文化学上注意的事，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在西方也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现今我们也只能说是刚刚开始。中华民族的伟大处，在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科学技术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虽然不可能产生像文化人类学这样的新兴科学，却仍然不乏关于这种现象

的零散的记录，给我们今天研究文化学提供宝贵的资料。在这个地区，唐宋时代就有一些与民间生活联系比较多的中下层士人给我们描绘了民间生产生活的生动图像，和关于风土节令活动的种种记录；明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生，城镇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于是表现市井生活、世态人情的述作也蓬蓬勃勃的发达起来，当时的苏杭二地成了俗文学的中心。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研究吴越文化的丰富材料。但这些都只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里结出的花果，眼界所及还是很有局限的。文化上的许多问题，在当时是没有、也不可能涉及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以及往后几十年带来的政治上的变革和经济上的发展，才给文化人类学的发生奠下了丰厚的土壤。工农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沉睡了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地下王国，被一座一座地发掘出来；远古时代我们祖先的生活世界，一个一个被打开和展现，大大的扩展了我们的眼界。

而今，我们站立在碧波万顷的太湖之滨，望着远远地卧躺在波涛中的隐隐如黛的远处岛屿，头脑中出现的不再仅仅是秀色可餐、风景如画的赞叹，我们的感情会被更辽远更幽邃的思绪所牵引，我们的眼光会看到我们的祖先披着兽皮出没在高山浅湖中追猎野兽的情景；这是八十年代在洞庭东西山之间的三山岛上洞穴中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所昭示给我们的。这个科学的产儿把我们的眼界扩展到一万年以前，对眼前的风光旖旎的太湖景色，给予了更深更广的透视。

同样的，当我们漫步在钱塘江两岸的时候，我们眼前出现的不会只是“参差十万人家”，也不会仅是今天两岸人民热闹而繁

忙的新生活，会把镜头推移到几千年前远古的祖先在荒凉的土地上踽踽而行的情况，我们会对这些远古时代祖先的智慧和不屈不挠的谋生精神发出由衷的赞叹，因为这两岸的土地上，如今挖出了几十座可以称之为地下王国的文化遗址。有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罗家角文化遗址；六千年以前的马家浜遗址；四、五千年以前的良渚文化遗址，是他们奇迹般地使这块土地成为我国稻作生产的千秋基业。

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也使我们的学者有机会更加深入地去挖掘民间生活的富藏，这些今天仍然流传在民间的风习和信仰活动，这些由历史造成的蕴藏在生活底层的民间文化，以前也许会被我们视作愚昧、落后、迷信，而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现在，也使我们留意起来，认识到他们既是历史上曾经普遍地在民间存在过，现今还在民间发生着一定的影响的社会现象。虽然由于新生活的冲击，它们注定要逐渐变形，以至于消亡的，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们代表着一个时代，对我们研究民间文化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们是研究民间文化的一种活化石。

吴越文化完整地说来，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它既有上层文化，也有底层的民间文化，因此研究民间文化是吴越文化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简单地说，民间文化就是存在民间生活中的属于自然状态而很少著之于文字的一种文化形态。

吴越文化就范围来说，目前学术界大致都认为即吴越地区的文化，它的地望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和上海的全部；从纵的方面说，它上及新石器时代的先越文化，下延至春秋战国以后各个朝代中人民所创造的文化。因为地跨两省一市，对它的研究，不同省市的学者着眼点也就有不同。

现今，吴越地区学者的研究，大致上有这么几种倾向，除了

把吴越地区作为统一研究的吴越文化外,又有偏重于吴地研究的吴文化,偏重越地研究的越文化,而且各已出了不少成果。

把吴越文化再分成吴文化和越文化,有助于地区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但这并不能代替把吴越地区作为整体的研究,因为吴越地区无论从自然生态环境、人文历史、民族构成和生活习惯、语言等等,很难加以截然分开,可以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大于异。一、从原始时代来说,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和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虽不属于一个文化系列,但互相之间的影响却是很明显的,特别到了良渚文化时代,这种差别就很小了。后来的吴地和越地都属于良渚文化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良渚文化的遗址遍布于吴越地区,当时的吴地和越地存在着同一个部落联盟,因而它们的文化基本上是属于同一个类型的。二、春秋时代,虽然分成了两个国家,即吴国和越国,但它们的属地也常有变动,很难截然划分的。两地的统治者虽都来自中原的华夏族,两地的居民却大多是百越族人。所以,《越绝书》中多次说到:吴越两邦,“同气共俗”,“同俗并土”。《吕氏春秋》中说得更明白,它引伍子胥说吴王的话:“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土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也然。”不但同气共俗,而且许多文化现象都是共同的,比如吴地和越地的平原地区都是历史悠久的水稻生产区,生产技艺、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信仰形态都是相同的;两地自然生态条件相同,皆属水网地带,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船,长于操舟,习于水战;因为地气潮湿,两地自古都住干栏式房屋,一直到现在两地民居格局也基本上是相同的;两地都以冶炼青铜器著名,春秋时期越有著名剑师欧冶子,吴有干将、莫邪,都造出了举世闻名的神剑等等,举不胜举。三、战国末期,越吞吴,楚灭越,两国的疆域早被打

破；秦汉时期，由于秦始皇、汉武帝的移民政策，吴越地区的民族构成有了重大的改变；三国时期，残留在浙江、安徽山区的山越族人也被驱逐和融合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几个小朝廷都建都在江南的建业，北人大量的南移，他们四散在吴越各地，更没有什么疆域的限制；特别是南宋以后，两地的文化已无本质的差异。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流布，更使旧日的地域之间的差别，进一步的缩小和泯灭了。但新的生产方式并没有把吴越地区的底层文化冲垮，民间仍然留存着种种自古以来就流传着的信仰和习俗，这种习俗尽管随地而异，带着地方色彩，但基本上却是从古俗一脉相承而来的。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看，吴越文化的整体研究，仍有重要的意义。本书是吴越地区学者在民俗文化学上联合进行研究的第二部著作，这个联合的第一个果实《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已于一九九二年七月呈献在读者面前。该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中外读者的好评，并且获得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度的特别奖，这对我们当然是个重大的激励，使我们有勇气按计划进入第二个课题的研究，本书就是这个研究的物化形式。

本书和前一个著作，我们称之为“姐妹篇”，那不仅是因为两者都是吴越文化研究总设想中的课题，两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而且内容上在不少地方有着密切的关连。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续篇，在前书中已经叙述过的内容，本书就尽量地避免，不予重复；如果问题相同的话，也尽量地挖掘新的材料来加以充实，也可以说是补充了前者的不足。

我们选择稻作文化作为我们第二个课题的研究对象，那是因为吴越地区是我国著名的稻区，水稻生产对人民的生活方式、



性格、心理、艺术创作和信仰，关系非常密切。生产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生产方式对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由自然生态环境而发生的生产样式、品类，对人类社会的生活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文化方面来说，我国的南方和北方就很有不同，北方由于地势高燥，气候干旱，适宜于种植耐干旱的作物——粟类，由此而产生了粟作文化；南方由于温湿多雨，发展了水稻生产，由此而产生了稻作文化。这种生产格局，从考古发掘的材料看，在我国形成至少有上万年的历史。以北方的仰韶文化和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来说，那时间也都在七千年左右，那时这种格局已明显地呈现出来。当然，南北方的文化并不是粟作和稻作可以概括的，社会越发展，文化的头绪越繁杂，除了以粟作文化和稻作文化为两地的标志之外，还有种种其他的文化现象，这期间相互交叉叠合，形成一时代、一地区特殊的文化形态。我们这本书不是全面的文化论著，顾名思义，只就稻作文化而论。

什么是稻作文化？稻作文化之名，以前我国较多地在考古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里使用，相当一个时期之内，这个术语基本上停留在科学界的圈子里，广大的文化界对这术语是比较陌生的，因此，当我们把问题提到民俗学和广义的文化学的领域上来时，就碰到了一些难以沟通的情况。这个课题的研究需要搜集稻作文化在民间生产和生活中的种种表现材料，也就是说要作广泛的实地调查研究。由于上述的原因，调查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实际文化岗位上的一些干部，不了解稻作文化包含的内容，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术语是陌生的。要经过一番解说，才能取得共识。其实，稻作文化的内容是大家日常碰到的，这一带的人可以说就生活在稻作文化的氛围中，是朝夕相处的事事物物，一经说穿，也

就释然于胸了。这情况说明，稻作文化在民俗学和文化学上的研究，在我国还刚刚起步，还不为广大的基层文化工作者所熟悉。

文化学上的所谓“稻作文化”，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除了从考古学和自然科学上研究水稻主体和它生产上有关的一些技术问题，以及它的起源、流变等等之外，还包括由于水稻生产而影响所及的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产中种种习俗，稻区人的性格、爱好以及文化心态等等。一句话，包括由于水稻生产发生出来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不同的生产作物区，既有共同的习俗和信仰，又有各自不同的习俗和信仰。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相同的共同体内，它的社会生活和习俗、信仰，基本上是会相同的；因为生产和生活都要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但各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传承的不同，以及生产产品的不同，又会有许多差异；稻作文化就是从这种差异中产生的。某一生产作物区的文化形态也不是单一的，以江南稻区来说，水稻生产是它的主要的生产作物，是当地社会主要的生活资料，它无疑的对稻区民间生活以重要影响，并影响和构造了种种以它为特色的文化形态。但一个地区的生产总是复合的，稻区除了稻作生产外，也还有其他的农业作物；这种生产上的复合性，即使在早期的农业社会里也是存在的，像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发掘的材料说明，除了水稻作物之外，也还有别的农产品；更不要说，当时除了农产品之外，还有在原始人生活中同样重要的渔猎生产物。在近代的江南稻区，这种情况就更加复杂。不过，本书的着眼点在阐释稻作文化，因此，把其他生产有关的文化因素抽象掉了，有的文化现象也受到其他生产样式的影响，这里也就简而不论了。

我国的水稻生产主要集中在长江两岸，特别是大江以南的

东南各省，吴越地区就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地区。这个地区包括著名的水稻产地，即太湖流域的苏、锡、常平原和杭嘉湖平原，钱塘流域的宁绍平原和金衢平原。说它是水稻生产的比较典型地区，主要就两个方面来说：一、这个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悠久，种植的地域广大、集中；二、直到近现代，这个地区的农作物还是以种植水稻为主要作物的农业格局；水稻种植在这里一代一代的传承了几千年，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许多稻区人民特有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信仰。

地下发掘的材料告诉我们，吴越地区的稻作生产至少有七千年的历史；一九七三年发掘的宁绍平原的河姆渡遗址，它的第四文化层内，稻谷堆积层最厚处达七十至八十厘米，最浅处也有十至二十厘米，据有的学者估算，堆积物有一百二十吨，这雄辩地说明当时稻谷生产已达到相当的水平。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有籼米也有粳米，其间还夹杂着从野生稻到培育稻过渡的中间状态的稻型，可以看出河姆渡的水稻经历着一个驯化过程；从野生稻培育成驯化的稻谷，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这意义上说，据科学界估算，河姆渡人进行稻谷生产，至少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现在，河姆渡已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是人类稻谷生产的发源地之一。

在吴越地区，和河姆渡同一文化时期的稻谷生产地并非只河姆渡一处，已被发现和发掘出来的还有早期马家浜文化的罗家角遗址，它的稻谷生产期，甚至比河姆渡还要早。河姆渡属钱塘江流域的宁绍平原，罗家角则属于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其间相隔几百里之遥，可见吴越地区在那个时期的稻谷生产的区域已相当的辽阔，不是某个地区的孤立现象。

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罗家角文化时期开始，吴越地区的水

稻生产不断得到发展,到六千年前的马家浜和四、五千年的良渚时期,水稻生产的比重不断扩大。河姆渡和罗家角时期,农业生产之外,渔猎还占着较大的比重,两地的地下都有大量野生动物的残骸遗存,证明当时还是半农半猎的社会。后来的马家浜时期,虽然在农业上已向前跨了一步,出现了一种体形较小的三角形犁形器,告诉我们马家浜时期的农业正开始从耜耕到犁耕的转变阶段;但渔猎采集的经济活动仍然占着一定的比重,也发掘出了大量的兽骨。到了良渚时期,农业更进一步的从耜耕进入到犁耕的阶段,有磨制精致的石犁、耘田器、斜柄破土器、穿孔石斧、石铲、有肩穿孔石铲等农具,作物除了以水稻为主体外,在有的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两角菱、甜瓜子、毛桃核、酸枣核、葫芦等种子,比河姆渡时期发掘出来的植物品种要丰富得多,可见种植业已较前发达。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手工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特别是玉器的制作,其精美程度令人叫绝。

从地域上说,河姆渡文化还只局限在宁绍平原一带,罗家角时期大致和河姆渡时期相仿佛,那时氏族活动范围还比较狭小,氏族仍以分散的、独立的形式活动,它们的文化带有较多个性,和同时存在的其他氏族,较多的存在着各自的生产和生活特色;互相之间的影响还比较小;到了马家浜时期,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种族繁衍、分化的结果,这时期氏族分布的地域有了扩展,据地下发掘来看,马家浜时期的氏族分布的范围,以罗家角、马家浜一带为中心,西拓展到常州、吴县和吴兴,东散放到上海青浦一带。当时氏族社会已进入到部落联盟的阶段,文化上各地虽然仍有自己的特点,基本上来说,都具有这一时期共同的形态。氏族或部落之间如果没有紧密的联系,是不可能的。

马家浜文化时期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跨入到良渚文化时

期，这是原始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已经露出了文明的曙光，照学术界一般的看法，这个时期属于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时期，出现了政权、军权和神权的权威人物。良渚大墓中出土的玉琮、玉钺、玉璧就是这种权威的象征物。良渚墓葬中不但看出财富的重大差别，而且有些地方还发现奴隶殉葬的明显痕迹，部落联盟有了比马家浜文化时期更加大的范围，地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sup>①</sup>从地下发掘的遗址告诉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地域，西到江苏的丹阳、江阴、常州；东到上海的青浦；南到浙江的沿海诸地：鄞县、奉化、象山等地，而且隔海到了舟山群岛。就是说，它的地望包括整个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外及海外的列岛上。在这个广阔的地域里，由许多氏族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它们各有管辖的领地，各有部落和氏族的首长，他们分别掌管各部落和氏族的政权、军权和神权。正如我们前面说的，这广阔地域里的诸多的各别的独立“王国”，共属于巨大的部落联盟管辖，共属于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宗族集团。在各个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玉琮、玉钺上，有的也在玉璧上，雕刻着同一个族徽，它的形状有简有繁，但它们是属于同一个徽记，是清楚的。良渚文化是从这个地区的早期文化（包括河姆渡、罗家角、马家浜）中发展而来的；吴越地区原始社会发展到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社会的丧钟已经敲响了，新的文明时代的曙光已经昭然若揭了。良渚文化时期已经是以前水稻生产为基础的古代农业社会。

原始社会以后的各个时代，江南地区在农业上仍以种植水稻为特色，古人早已言之，在《周礼·职方氏》上就说：“东南曰扬

---

<sup>①</sup> 近年来更有学者提出良渚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国家的见解，见《文汇报》一九九五年一月六日的报导。

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藪曰县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三千年前的周朝，古人已经认识了江南适宜于种稻的地理特性，周代的所谓扬州，包括淮河以南直至浙江、江西，而其中心则在吴越地区。在古籍中，说到南方种稻的地方不少，写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就盛赞“南海之稻”<sup>①</sup>；《越绝书》和《吴越春秋》都说到大越之地的“乌田”和“乌田之利”等等；《史记·货殖列传》中也有“楚越之地，饭稻羹鱼”的记载。《淮南子》则说：“荆扬二地，其谷宜稻。”大体上都指明江南地区适宜于种水稻和人民喜食稻米的事实。

南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江南的水稻生产已相当发达，这在古书屡有记载，这里不再赘说。以江南来说，吴越地区是水稻生产最发达的地方，宋代的太湖流域的水稻面积产量居全国之首，平均亩产已达二三石米，比全国平均产量高出30—100%<sup>②</sup>。吴越地区水稻生产上的优势，在稻谷品种的众多上，也可看出，元至顺《镇江志》上说：“江南稻种甚多，不可枚举。”明清时志书上记录的水稻品种统计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见下表）。

无论从水稻的分布面和稻种的数量，东南数省都遥遥领先，尤以吴越地区的江苏、浙江为突出。明李绅在《请治水以防灾荒》中说：“直隶之苏松常，浙江的杭嘉湖，约其土地，虽无一省之多，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况他郡所输，犹多杂赋，六郡所出，纯为粳稻。”<sup>③</sup>这一段话，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在明代，太湖流域的水稻产量大大超过其他地区；二、这个地区是纯水稻地

① 《吕氏春秋·本味篇》：“饭之美者，元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稌，南海之稻。”

② 参阅《江苏农业发展史略》。

③ 见《授时通考》卷六十。

区,水稻生产占农业产品的极大部分,以至其他粮食的生产变得无足轻重。

省 别	府、州、县数	品种数(种)
浙 江	25	530
江 苏	21	525
江 西	26	465
广 东	25	387
安 徽	17	347
福 建	23	374
湖 南	11	270
广 西	3	84
四 川	4	42
陕 西	3	26
河 北	8	16
河 南	7	15
山 东	14	/
山 西	3	/

这种情况到近代虽然有些变化,但江南地区为水稻生产区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以浙江说,粮食作物面积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90%,而水稻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76%,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85%<sup>①</sup>。江苏南部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宋以前,太湖稻区是一年一度的水稻种植制度<sup>②</sup>,也就是说,宋以

① 参见《浙江地理简志》。

② 参见江苏农业厅编《江苏农业发展简史》。

前太湖地区还是纯稻区；南宋时期，北人南来的人数众多，南宋王朝提倡种麦，才逐渐形成一稻一麦的两熟制，但水稻生产仍然占着主要地位。直到近现代也还是如此，《无锡县志》对无锡县的种植品类有个详细的统计：“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年）全县一百二十五点五万亩耕田，稻田为八十四点一万亩，占67%；桑田二十五点一万亩，占20%；菜瓜田十点一万亩，占8%；其他占5%。解放后一九五二年全县一百三十点五万亩耕田，稻田九十四点七万亩，占74%；桑田二十六点一万亩，占18%；大豆、薯类、瓜菜占8%。”上述资料说明，吴越地区在宋以后，农业逐渐走向多种经营，但直到现代，种植水稻始终是这一地区的重要特征，自古以来，吴越地区始终是我国重要的水稻生产区。

水稻生产在稻作区是一种基本的生产活动，水稻生产在人民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的饥饱寒暖取决于它的产量，因此人民的悲欢忧乐都围着它的丰歉转，稻丰则喜，稻歉则悲。在稻区，稻收称为大收，麦收称为小收，麦子和其他作物歉收，不至影响全年的生活；稻谷的歉收，一年的生活就无着，势必弄得全家挨饿，甚至外出逃荒，流离他乡。麦收是辅助性的，稻收才是维生的正宗。

由于水稻生产在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它必然影响到稻区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可以说，水稻地区的民间文化大部分是属于稻作文化的，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諏访春雄教授在和我讨论稻作文化时，曾语简意赅地说过一句话，我认为在稻区，他的话是不错的。他说：“弄清了稻作文化，那末，文化上的大部分问题也就弄清了。”话虽只有一句，却是日本学术界多年来在文化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的结论。读者从本书的内容的广泛性上是可以体会到的。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稻作文化从民俗学的角度说，在我国还是涉及较少的一个学科，本书是在这方面极端缺乏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开始进行研究和写作的。在许多地方，这个研究不得不从最基本的方面着手，即向广阔的吴越地区的村镇去作社会调查，藉以取得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同前一本书一样，我们采取了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召开调查会，组织参与会议的当地的文化干部把调查材料写成调查报告等等方式，把材料逐步地聚集起来；同时，也搜集古代的和近代的已经记录和出版的文献资料，来开始我们的研究。

在材料聚集过程中，证实了諏访教授的话，稻作文化确实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它涵盖的面是很广的。依我们搜集到的材料看，它在人类文化的三个层次上都体现了出来，它涉及到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读者可以在本书的章节安排上看得出来。当然，本书所叙述的只限于我们搜集到的材料的范围之内，不是稻作文化的内涵已经尽于此了。

关于本书的内容还要说明一点，除了三个层次之外，最后还安排了一个章节《日中稻作礼仪的比较研究》，这是日本学习院大学的諏访春雄教授特地为本书撰写的。日本学术界对稻作文化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日本民俗学的鼻祖柳田国男和折口信夫就对日本的稻区作过较多的调查，并有不少著作流传于世。后来的学者在这方面作过更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可以说，在日本，稻作文化是一门已经作了比较深入和系统地研究过的学科。但近些年来，由于世界上一些国家，特别是与日本稻谷种植关系比较密切的中国江南地区的稻谷遗存的大量发掘，在日本学术界提出了重新审视稻作文化的某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稻谷的起源究竟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它是怎样流布开来的，它的流传的